

上海解放后建立公安系统往事

进入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负大局已定,接管上海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各项接管工作中,公安系统的建设关系社会秩序稳定、关乎日常生活恢复,具有紧迫性、敏感性和重要性。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支队伍的诞生,更是“人民公安为人民”这一始终不变的誓言。

“拆屋重建”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明确指出必须“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949年2月,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号召,要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

华东局迅速行动,从山东、苏北等老解放区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南下队伍。时任华东局城工部副部长王尧山回忆:“济南解放后……接到华东局指示,要周林、赵毓华等同志和我负责,组织率领一支‘南下干部纵队’,参加接管上海这个重大任务。”这支队伍来源广泛,既有来自华东局财委、山东军区后

勤部的2000余人组成专司财经接管的“青州总队”,也有1949年初从山东各地精选的700余名地方干部、华东警官学校的上千名青年学员及700名经验丰富的公安干警。

1949年5月,数万干部在江苏丹阳集训。5月10日,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在向排以上干部的讲话中强调,“现在全党的中心要转到接收城市、保护公私财产”。这是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是方针政策、政策思想的转变,“要有新的斗争方式”。5月25日深夜,梁国斌、李士英等人率公安接管干部抵达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5月26日黎明,李士英与上海地下党警委书记邵健会师。对于旧警察局,正式确立“拆屋重建”的方针:彻底摧毁其反动机构,但对旧警人员,“则经过审查,量才录用”。得益于地下党的保护和进步警员的努力,旧警察局十余万卷宝贵档案绝大部分得以保存,为顺利接管及后续工作提供了关键依据。

5月28日,梁国斌、李士英和各分局的接管专员等人分别率领接管干部进驻警察总局和各分局。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成立,李士英任局长,设立秘书、人事、行政、社会、刑警、消防、供给七处及一所警务学校

和31个分局。至此,上海的人民公安体系正式建立,“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旗帜在上海高高扬起。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后,一场全局性政治学习迅速展开。从“人民民主专政”到“警察与人民的关系”,讨论异常热烈。许多旧警察第一次意识到,警察不再是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应当成为保护人民的力量。旧警察沈大钧直言:“以前我们当警察,是为了填饱肚子;现在我们当警察,是为了让百姓安心。”

1949年6月7日,陈毅在警察大会上表示,希望旧警员认清形势。只要转变立场,拥护人民政府的领导,忠心为人民服务,政府将一面录用一面教育,有功者奖,犯罪者罚,决不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的机会,但对不愿悔改,企图利用人民的宽大,从事潜伏破坏的坏人,定当严惩。随后,市公安局成立学习委员会,南下干部与旧警员混合编组学习,每人预发生活费2000元(旧币)。

面对成分复杂的旧警察队伍,新政权采取“大胆使用、抓紧甄别、逐步改造”的务实策略。7月,遵照华东局整编节约方案,对1000余名巡官以上人员和政治面目不清者进行整训,400余人被清洗或自动离职。

7月1日,北站分局留用警察董伟生执勤时遭匪徒枪击殉职,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牺牲告诉旧警员:“人民公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生命线。”在局务会上,李士英进一步定下基调:“凡公安局

的干部警员,视工作好坏为准则,而不以新旧人员之分。以忠诚为人民服务为最高标准。”

纪律面前,人人平等。10月,行政处秘书张醒夫等人因遗失臂章被记大过;12月,南下干部侯毅因执法警惕性不足致同事受伤被记过。还有干部因文件写错数字被停岗三天,这名干部反思道:“我第一次明白,人民的警察必须对人民负责!”

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新政权的威信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的能力上。1949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发布《关于驻卫警、义勇警和私人枪支管理办法》布告,开始整顿枪械。全市登记3662人,收缴公私枪支2021支,子弹2万余发,长期混乱的社会治安状况得到迅速遏制。同时,各业务部门高效运转:特营科果断关闭妓院,取缔黄赌毒,规范特种行业;交通科修复路政设施,整顿交通秩序;消防科整编旧队伍,积极防火防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公安一方面协同解放军警备部队大力围剿武装股匪,另一方面坚持专门工作与依靠发动群众相结合,抓紧侦破现行案件。仅用半年时间,就破获重大盗抢案665件,捕获盗匪1667人;侦破间谍特务案件652件,逮捕间谍特务5675人;抓获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10510人。

至1949年夏末,上海城市巡逻恢复,户籍重新登记,商铺开业,电车通行,苏州河码头秩序井然。

据《解放日报》

版画家力群与鲁迅的“神交”

1931年秋,力群刚进入国立杭州艺专不久便遭遇“九一八”事变。亡国之痛让爱国学子们无心作画,力群常与同窗商讨救国之策。此时,鲁迅倡导木刻艺术反映民间疾苦、为劳苦大众服务,其言论让年轻学子们豁然开朗,决心以木刻唤起民众觉醒。

1933年春,力群等人发起成立“木铃木刻研究会”,以版画为武器救国。“木铃”在杭州方言中是“傻瓜”之意,力群以此命名,表明要义无反顾投身新兴木刻运动。同年夏天,力群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首届木铃木刻展览于1933年4月1日在杭州艺专开展,作品主题鲜明,力群的《病》《生路》等获好评,《木铃木刻集》被抢购一空。展览结束后,他们寄书给鲁迅请其指导,鲁迅开始关注这些青年木刻家。

“木铃木刻研究会”影响渐大,引起国民党当局恐慌。1933

年10月,力群等三位木刻青年被捕,鲁迅在《写在深夜里》揭露国民党暴行。

一年多的牢狱生活让力群意志更坚定。出狱后,他辗转多地,鲁迅时常挂心其安危。力群的木刻画通过同学曹白转交鲁迅,鲁迅再通过回信指导。1936年,力群响应号召创作《采叶》,鲁迅认为此作最好,还指出《三个受难的青年》和《鲁迅像》的优缺点,鼓励力群改进。

1936年10月初,力群错失与鲁迅见面的机会。19日鲁迅逝世,力群受邀为鲁迅画遗像,他强忍悲痛,完成四幅画像,其创作的鲁迅画像成为经典形象。

在鲁迅引领下,力群投身中国新兴木刻运动,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艺术家的。他还撰写多篇回忆文章,表达对鲁迅的敬重与感激。

据《老年文汇报》

